

上 篇 “语录”浅论

一、语录体著作的发端与发展

“语录”是一种文体，是文章写作的一种样式。“语录”一词最早被用作文章写作样式的称谓是《旧唐书》在《旧唐书》经籍志杂史类有孔思尚宋齐语录十卷。但“语录”这种文章体式绝不是自唐代才出现的，上可追到《老子》、《论语》等著作都应称之为“语录”。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能否对“语录”这种文体给出这样一个定义：“语录”是圣哲贤人对自然的、社会的难于解答或解说混乱的问题，所做的哲思短语式的解答。这些解答可以是圣哲贤人以书面的语言形式做出的，也可以是非书面的言语解说，此后由其门人弟子或再传门人弟子凭记忆进行整理汇集的。其结构形式可以是整部著作主题单一明确，前后一以贯之，但每一单一段落都能独成一体，完整回答某一单纯问题，如《老子》；也可以是整部著作所谈问题甚多，一个主题一个段落，如《论语》。

我们之所以要把“语录”这种文体样式界定为非得是圣哲贤人的哲思短语之内，是因为以相似的文章体式而写成的一事一记或一事一议的著作很多，但在历史上都没有人把这些著作称之为“语录”，而皆已有了其文章体式的名谓或归属，如“札记”、“杂谈”等等。为什么我们的先人不把这些“札记”、“杂谈”等等称之为“语录”呢？想来其原因大概有二，一

是其作者不是在历史上颇具影响的哲学家，其在社会上的影响 无论是在世之时 还是人死以后 他本人和其著作都没有给社会带来重大影响；二是就其整部著作而言 并非皆是哲思短语 偶有几则哲思短语 并非能使整部著作成之为‘语录’。

应该指出的是 在我们匡定了‘语录’之所以成之为‘语录’的诸项条件时 佛学却应该是一个特殊的例外。我们不可否认，在我国历史上不乏名僧大德，但他们的著作却很难找出纯然为哲思短语的经藏来，而佛家的名僧大德和一些名禅师的有些极为睿智以及极为精彩的哲思短语，却散见在所有佛学经典之中。宋僧道原所著《景德传灯录》就是把散见于各经的名僧大德和著名禅师的哲思短语，汇集到一起的著作。虽然所集并非都是著名哲学家的哲思短语，在社会上也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其语言的思辩可说是光华璀璨。在佛学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景德传灯录》亦应是‘语录’体著作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语录”在我国文章体式形成的历史上 应该是最早形成的文章体式之一。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几部著作 如：《周礼》、《尚书》、《诗经》、《周易》、《春秋》和《老子》等 其中《老子》和《尚书》的《盘庚》篇，已被认定为语录体著作 而《周礼》虽传说是周公姬旦所著，但据考证，此书所记与周时制度多有不合，有人认为此书实为伪书，是王莽时刘歆所作。如此说成立，那么此书就应该在被称之为中国最早的几

部著作中剔除。《尚书》传说为孔子所编选，但其成书顶多与《老子》的成书年代相同或稍晚。《诗经》传说为殷周时代的民歌精选，也为孔子所编选，诗之内容虽来自殷周，但那只是口耳相传而已，实际成书年代还是老子和孔子时代，顶多亦只能与《老子》的成书年代相同或稍晚。《周易》虽说是记载商周时代占卜和易理的书，但却没有说此书产生于周代，即使成书于周代，周也有西周、东周之分，春秋、战国即都为东周。而且有人还说，《周易》乃周遍之意，并非为周代的占卜之书。由此看来《周易》的成书年代也不会早于《老子》。《春秋》据说为孔子所著之书，而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也和孔子时代相合。所以《春秋》也可以说其成书也要晚于《老子》。对于《老子》虽然也有人说并非出自老子之手，其根据为《老子》书中有不少战国时之词语。但大多数人认为：《老子》即为老子所著之书，至于书中间杂以战国时的词语，那是因为在战国时代有人对《老子》进行过修订之故。所以我们差不多可以完全肯定《老子》是我国最早的形之于文字的书，其它之书在《老子》之前都没有形之于文字，其形之于文字顶多与《老子》同时，或晚于《老子》。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语录”这种文章写作样式，是中国最早的文章写作样式。

“语录”这种文章写作样式，之所以会成为中国最早的文章写作样式，恐怕与书写工具的笨拙以及其局限性有关。我们都知道，远古最早出现的记事形式是结绳，所谓结绳而治就是此意。“结绳”只不

过是一种计数的记载 所能‘结绳’而记的事物 那必是十分简单而且易记之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种结绳而治的方法远远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形势的需要 这就造出了文字。文字的造出 其书写工具也就随之而出现了，最早的书写工具都是什么，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其中笔的前身刀子肯定是书写工具之一。因为我们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中，可以知道，殷人的卜辞是用刀子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除龟甲兽骨之外，殷人还用过什么作为与刀子配套的书写工具，我们不得而知。竹子是什么时候与刀子配套成为书写工具的？毛笔又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们只能来一个大致的猜想。那就是毛笔的出现与篆文的形成应该相去不远。钟鼎文字虽然已经具有了篆文的某些特点，如笔划的圆润等等，但钟鼎毕竟是由模具浅铸而成，而每一钟鼎所配文字不多，大可以象画画一样进行精雕细刻，我们完全可以大胆设想，金文时代还没有出现毛笔。那就是说，毛笔的出现，应该在距秦统一中国之前不太长的时期之内。因为有了毛笔的出现才可以随意书写出那种笔划圆润规格整齐的篆书来。

现在我们再回到“语录”这种文章写作样式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最早的文体的这样一个问题上来。我们知道老子与孔子属于同一时代之人，其年龄较孔子略长 老子写作《道德经》之时 是在孔子向他问礼之后，此时的孔子应该已过壮年。而孔子生于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如按此时为四十岁计，当在

公元前五百一十年左右。以我们上述的推断，那时毛笔还没有产生，书写工具可能是刀和竹简。用刀子 在竹简上刻字，是很费劲的事，所以他在西出涵谷关 被守关令尹喜挽留而作《道德经》 虽然仅仅为五千字，虽然他还着急出关，他还是用了整整七天的时间。这是否可以说明，在当时书写工具十分不趁手的情况下 客观地要求 任何的著作 它的文字量都不能太大，要把自己的思想观念表达出来，而又不能用大量的文字“语录”体是最好的写作样式。孔子选编《尚书》 选编《诗经》 记录《春秋》。《诗经》自不待言 总计三百零五首民歌 文字量自然不大；《尚书》、《春秋》都以编年体记载史实为主 所记都极其简化 文字量也都不大 而且《尚书》中的“盘庚”还是以“语录”体写成的。在做这些工作时 孔子的时间自也不象老子那么匆促，且还有三千弟子帮忙，以刀简作为书写工具是可以胜任愉快的。老子、孔子之后，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把孔子的言论编写成书 名之曰《论语》。墨翟作《墨子》 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 反对儒家的繁礼厚葬 提倡薄葬非乐。所使用的文体 也都是“语录”体。可见那时，毛笔尚不曾问世。

毛笔的出现，可能是庄周时代的事，庄周生于公元前三百六十九年，死于公元前二百八十六年。庄周去世之时，下距秦统一中国的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仅为六十五年，也就是说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的百年左右时间内出现了毛笔，才得以使庄周完成

了十余万字的《庄子》一书。《庄子》一书首先打破《春秋》、《老子》的文章写作体式而以“寓言”这种全新的写作样式去表明他的思想观念，形成了一种新的文章写作样式。与旧有的《春秋》、《老子》的文章写作体式相比，它让人耳目一新，极具感染力和可读性，使人爱读，同时也耐读，如其中的《逍遥游》。现抄录如下：

北冥有鱼，其名为 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鲲化而为鸟，其名为 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 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蜩与学，鳩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 三 冷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

春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爍不

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鷦鷯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惟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蕪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眇然丧其天

下焉。”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乎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网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其实庄子的这篇逍遥游，论讲道理只不过是讲天生万物，各有其禀赋，大有大的禀赋，小有小的禀赋，大有大的志趣，小有小的志趣，大有大的欢乐方式，小有小的欢乐方式，只要随其自然，那就是“逍遥”。如用‘语录’体去说这个道理，恐怕比上述语言还要精少。但庄子却洋洋洒洒写了将近一千余言，读来让人感到鞭辟入理，妙趣横生，确乎言在理中。庄子能留下如此美文妙文，如不是已出现了毛笔作为书写工具，如用刀刻他又怎能以如此数量的文字去反复比譬说来并不复杂的道理呢？与庄子同时的孟珂所作《孟子》一书，虽然也是‘语录’体式，但其用词也已不象《春秋》、《老子》、《论语》那么吝啬。《春秋》并非‘语录’体式，就不去说它了，而《老子》、《论语》在讲说老子和孔子的思想观念之时，虽然多有精警醒世之语，但由于用词之吝，后来读来颇有费疑猜之处。特别是《论语》在不同情境之下，所说的不同话语，对语言环境及思辩过程都不做交待，只是强行把思辩结论推出，而整个思辩过程却须要读者自己去完成。相对《老子》、《论语》，《孟子》在上述方面已有很大改进。如“孟子见梁惠王·二”：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

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如以《论语》用词之吝，此段语录大可简至“孟子见梁惠王于沼上，王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用字不及原文三分之一。而《孟子》则能多引周文王筑灵台、掘灵沼的典故以增论说的强度和感召力。这不能不说是因为书写工具的改善，才得以在“语录”体式的文章中，也出现了文学色彩。

“语录”体的著作，为先秦诸子的主要写作方式。其主要原因是书写工具落后，制约了思想家们的文体创新。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想象能有象今天这样的宏篇巨制的著作问世。毛笔的出现也仅能改变书写中的繁杂而痛苦的体力耗费，但作为与笔对应的书写工具竹简还没有得到改善，一部著作容量之大，搬运贮藏之困难，都是当时不宜出版宏篇巨制的著作的原因。此种情况一直持续延长到汉代。先秦诸子中其它非语录体著作，有些为后人所伪托而作，有些虽为本人所作，但篇幅也都不甚大。《史记》为西汉最巨之作了，但司马迁老先生是以国家之力为依托的。

到了公元百年左右，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给著作家们提供了驰骋思想的方便，文章写作体式多有创新。著书立说已不仅仅是被公认的思想家的专利了。但“语录”体作为思想家表述其思想观念的方式，仍然是主要的写作体式，并且一直延续到

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造成这种局面的发端者是汉初的董仲舒，虽然我们尚没见到他之用‘语录’体式所著之书，但他所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和他所说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自他以后几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儒学作为国学，把儒家思想作为对民实行统治的指导思想。因此孔子也就成了千古圣人。对孔子的尊崇同时也导致了对《论语》的摹仿。自汉代以后就先后出现了多部仿《论语》之著作，如扬雄《法言》、桓宽《盐铁论》，程颢、程颐《二程语录》、朱熹《朱子语类》。据说《孔思尚宋齐语录》也属此类，但不之见不敢妄下断言。虽非论述儒家思想，但也是仿《论语》以‘语录’体而完成的著作。《景德传灯录》在佛学界影响之大，也是令人不敢侧目的。

关于扬雄及其《法言》、二程及其《二程语录》、释道原及其《景德传灯录》、朱熹及其《朱子语类》，本书在选注和选评其语录之时，将对作者及其著作都作简略的介绍。在此就不做赘言了。至于桓宽的《盐铁论》和孔思尚的《孔思尚宋齐语录》本书不想对其做选注或选评，所以在此还需要稍加解说。

桓宽，字次公，为汉汝南人，其生卒年不详，只知汉宣帝时曾做过著作郎，后又被外任为庐江太守丞，据说此人博通善文，做学问以治《公羊春秋》而知名。其《盐铁论》是记述汉始元六年，昭帝征集郡国贤良文学之士，向他们咨询治乱之策，引发桑弘羊

与“贤良文学之士”就盐铁、榷酤、均输进行大辩论的书。当时这些“贤良文学之士”都提出罢黜盐铁、榷酤、均输，独御史大夫桑弘羊以为不可废，因而昭帝决定只罢榷酤，盐铁、均输皆不变。汉昭帝始元六年为公元前八十一年，至宣帝时仅隔八年，宣帝在位二十五年。桓宽写作《盐铁论》时虽不应在宣帝刚继位时的本始元年，即公元前七十三年。也不应在宣帝死去之年的甘露五年，即公元前五十年。也就是说，桓宽在作《盐铁论》时，相去桑弘羊与众“贤良文学之士”就盐铁问题展开大辩论之时，相隔不及二十年。所以桓宽对当时的辩论或口传，或访当时之知情者，都可得到充实可信之材料。该书共六十篇，所论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盐铁论》的价值除对时政之辩论有可窥当时社会状况的作用外，由于参加辩论的都是饱学之士，辩论中引经据典颇有对上古文献拾遗补正之作用。本书之所以没选其中语录，是因为该书就其一事，所论甚长，不便选辑，而且说其为“语录”体，总有些勉强。现录其一，以资读者明鉴。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圣人之术，有名列于孔子之门，皆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数人。云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宰我秉事，有宠于齐，田常作难，道不行，身死庭中，简公杀于檀台。子路仕卫，孔悝作乱，不能救君，出亡，身

蒞于卫。子贡、子皋 遁逃不能死其难。食人之重禄不能更 处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于己而薄于君哉 桐门共业 自以为知古今之义 明君臣之礼 或死或亡 二三子殊路 何道之悖也？”文学曰：“宋襄公知孔父之贤而不早任 故身死。鲁庄知季有之贤 授之政晚而国乱。卫君近 佞远贤，子路居蒲，孔 悝为政。简公不听宰我而漏其谋 是以二君身被放杀 而祸及忠臣。二子者有事而不与其谋 故可以死 可以生 去止 其义一也。晏婴不死崔庆之难 不可谓不义 微子去殷之乱 可谓不仁乎？”大夫曰：“至美素朴 物莫能饰也 至贤保真 伪文莫能增也 故金玉不琢 美珠不画。今仲由冉求 无檀 柘之才 随和之璞而强文之。譬若雕朽木而砺 鋏刀 饰嫫母画士人也。被以五色 斐然成章 及遭行潦流波则沮矣。夫重怀古道，枕籍诗书，危不能安 乱不能治 邨里逐鸡 难亦无党也。”文学曰：“非学无以治身 非礼无以辅德 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宝也 待 鑑识之工而后明。毛 嬙天下之 姣人也 待香泽脂粉而后容。周公天下之至圣人也 待贤师学问而后通。今齐世庸士之人 不好学问 专以 己之愚而荷负巨任 若无 楫舳 济江海而遭大风，漂没于百 仞之渊 东流无涯之川 安得沮而止乎？”大夫曰：“性有刚柔 形有好恶 圣人

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变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长剑去危冠，屈节于夫子之门。然 撮齐师友 行行尔鄙心犹存。宰予昼寝，欲损三年之丧。孔子曰：粪土之墙不可污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内无其质而外学其文，虽有贤师良友，若画脂镂冰，费日损工 故良师不能饰戚施 香泽不能化 嫫母也。文学蒙以不洁，鄙夫掩鼻，恶人盛饰可以宗祀上帝。使二人不涉圣人之门，不免为穷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 砥所以致于刃 学所以尽其才也。孔子曰 觚不觚 觚哉 觚哉。故 事人加则为宗庙器 否则斯养之 璽才。干越之 铤不厉 匹夫贱之。工人施巧 人主服而朝也。夫丑者自以 姣 故饰 愚者自以为知，故不学。观笑在己而不自知，不好用人 自是之过也。”

似上面这段语录，非选全而不知其完整之意。正如笔者前面所言 对于多数学者把《盐铁论》定为“语录”体式的著作 总觉有些勉强。笔者认为 此说起码缺少两个构件做为支撑，一是它并非为那种精警的哲思短语；二是为何人之“语录”尚不明确，如为桑弘羊之语录，那么文学之士的话语又是什么？而且无论是桑弘羊还是文学之士，都没有所说即“真理”的权威性。笔者仍坚定地认为：“语录”应当是“名言警句”是被视为“真理”不断被引用的话

语 虽然它可能并非“真理”但它必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被大多数人认定是真理。《盐铁论》既然被多数学者认定为“语录”那么笔者也就只得在此做以补叙。《孔思尚宋齐语录》载于《旧唐书》但只是有目无书 笔者也没能查到此书。此处不再补叙。关于“语录”体自汉以来的流变 还要补充一句 近几年来有不少摘引当世“名人”著作的章句集腋成书，多为文辞华美之作 但此绝不是“语录”体著作。

二、语录体著作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

“语录”这种体式的著作，在中国馆藏图书中，其种类虽然不多，但却非常之普遍，几乎任何一个图书馆都有“语录”体的著作馆藏 即使寻常藏书人家 也都所在多有。可见“语录”体的著作 在中国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中国的三大宗教，其中有两大宗教是发轫于“语录”体著作的。佛教是外来之宗教，除了佛教之外，其实中国本土的两大宗教都发轫于“语录”体著作。道教发轫于《老子》 创教祖师张道陵，虽然没有什么著作问世，但其创教则是以阴阳合谐为创教理论的，那正是老子一书中最为著名的理论观点之一。《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老子说“天生万物

都是阴阳合谐的产物，无论是阳盛而阴衰还是阴盛而阳衰的不合谐，都会使整个世界或万物本身受损乃至灭亡。道教取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字作为教名，取其“万物负阴而抱阳”的“阴、阳”二字作为教义的根本，而创立了道教。儒教则是以《论语》作为最高经典，以对读书人的总称“儒”作为教名，以《论语》和《论语》而后的对《论语》理论的发展与升华的众家儒学学说为教义而创教。对于儒教是否为教，尚有许多争论，但主张“儒教是教”的学者们认为，儒教是中国古代政教一体，始终居主导地位的宗教，儒教诞生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完成于南宋程朱理学兴隆的时代。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国，取消了国家元首祭天的礼仪，儒教就失去了物质载体。这种说法是有其合理性的。

“语录”体式的著作，不仅对儒、道两教具有发韧性的功能和作用，同时对于儒、道两教的发展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而且还不完全是如此。自《老子》和《论语》这两部“语录”体的著作问世以后，其对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老子》在东周时代的影响，主要是学术思想的影响，《老子》之后的学术著作如，《论语》、《孟子》、《列子》、《墨子》等等都或多或少可以见到在自然观方面对《老子》思想的肯定。就连当时非常狂傲的孔子也和学生们说老子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圣人。庄周更是承继了老子的思想，以其十余万字的《庄